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 于俊道
主 编

叶剑英 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于俊道■主编

叶剑英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剑英交往纪实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5884 - 5

I. ①叶… II. ①于… III. ①叶剑英(1897~198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71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 云
特约编辑 丁 云
责任校对 张 敏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和毛泽东	范 硕	1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和周恩来	范 硕 丁家琪	44
“我们要更加努力,多做些工作”——叶剑英和朱德	刘 梭	57
持正相倚 巍如秋山——叶剑英和邓小平	杨言东	66
“彭总救过我的命”——叶剑英和彭德怀	张 晓	83
情深似海——叶剑英和刘伯承	王水石	87
肝胆相照情谊深——叶剑英和贺龙	贺捷生	96
“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叶剑英和陈毅	雪 光	106
“射虎屠龙宿有志”——叶剑英和徐向前	范 硕 张 麟	114
“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聂荣臻	121
将帅星河中两颗亮星——叶剑英和王震	范 硕	124
“经得艰难考验时”	薄一波	131
“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抓好军队”——叶剑英和李德生	金立昕	139



良师益友	王首道	143
“我赠你六句话”——叶剑英和习仲勋	金立昕	144
学识渊博、锐敏睿智	张震	146
在叶帅身边工作的日子	任修权	150
深谋远虑 急流勇进	杨成武	161
“你们下去,到各地走一走”——叶剑英和任仲夷	广办	164
“新的好的事物总在实践中”——叶剑英和钱益民	方前	166
“你要为培养党的飞行人员奋发努力啊”	吕黎平	168
“行廉志洁泥无滓”——叶剑英和李振军	武京	178
“决胜屠鲸载史篇”——叶剑英和欧初	范硕	184
“要永远记住他的恩情”——叶剑英和卢伟良	路叙	188
一段难忘的往事——叶剑英和夏之栩	倪素英	191
“湖南妹子能吃苦!”——叶剑英和陈子璠	倪素英	193
“我同意你们一同回川”——叶剑英和刘德明	金立昕	195
“赶紧派人带我去”——叶剑英和曾威	王红云	197

“国防方面的工作也请您多费心!”——叶剑英和华罗庚	林 渺	200
“台澎故旧应是思归切”——叶剑英和钱昌照	云 香	201
冬夜凝思	刘白羽	203
“只有中西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名医”——叶剑英和薛愚怀	李树喜	206
延水深情——叶剑英和任友青	金立昕	208
阑干拍遍叶帅情深	岳美缇	212
攀登艺路指前程——叶剑英和张洵澎	张 乙	217
“民族解放的血花”——叶剑英和陈华	陈广杰	218
“你为祖国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叶剑英和马万祺	范 硕	220
患难铸真情——叶剑英和柯麟、柯平	范 硕	230
“谁反对参谋长就是反对我”——叶剑英和张民达	易 生	236
“寄心海上云,千里常相见”——叶剑英和邓演达	朴 实	242
“内战吟成抗日诗”——叶剑英和张学良	雷 雨	246
分道扬镳——叶剑英和蒋介石	傅师吾	254
“应该团结抗日”——叶剑英和汤恩伯	吴众文	262

“到敌人后方去!”	谭安猷	263
胆识非凡 品格高尚	张廷栋	264
“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	李俊山	279
“这里的工作很重要,你们要当好参谋,把好关”	唐彦武	281
“不能因为给我打针而紧张”——叶剑英和孟宪臣	梦文	284
叶帅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罗正祥	286
老乡情——叶剑英和李月华	居里忆	287
兄弟情	叶道英	291
父亲的遗教	楚梅	294
可爱的父亲	凌子	298
无字的枫叶	文珊	301
“柯棣华是中印人民友谊的象征”——叶剑英和郭庆兰	果一文	305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剑英和加伦	赵东升	309
编后记		313

“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和毛泽东



毛泽东的大名，叶剑英是在大革命时期听说的。但两人真正相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到苏联留学，1930年初回国后，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向往毛泽东在江西创建的中央苏区，便主动要求到那里去搞军事工作，经周恩来同意于1931年4月到达瑞金。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中共中央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叶剑英到达苏区之后，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

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于2月又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理由是，敌军步步为营，严密包围，红军相对弱小，只有分散到苏区外面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去，才能保存红军和苏区。二是主张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

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苏区，摆脱敌人。有人还搬出斯大林的话证明“四川是中国革命的理想根据地”。这两种意见，实际上代表了项英等人的观点；与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的意见，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面迎击敌人。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央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未明确表态，但倾向于项英的意见。毛泽东始终不同意项英的意见，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主张采用后一种打法。

由于几种意见的争论相持不下，无法统一，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由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红军好，士气旺盛，上下团结，军民一家，求战情绪高，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第二群众好，苏区人民翻身得解放，分了田地，拥护红军，仇恨敌人；第三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预想的战场去消灭。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毛泽东引而不发地提出这一问题后，许多军长、政委踊跃发言，主张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叶剑英在毛泽东发言时，边听边记，认真思考。他是第一次听毛泽东作这样精辟的发言，心中顿时豁然开朗，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于是，他在会上发言，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讨论如何打的问题。

林彪首先发言，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有人主张拣小的打，一块一块切，一口一口吃，先吃掉小的敌人。林彪坚持己见，强调“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他接着说：“我主张打中敌，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毛泽东提出先在赣江西边打第五路军，这一路兵力多，是敌人“围剿”的主力，但这支部队刚从北方来，水土不服，战斗力不强，打垮他们是有把握的。而且打垮他们之后可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秦

宁扩大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赞成，叶剑英也发言表示同意。于是，苏区中央局确定了先拿第五路军开刀，再各个击破的战役计划。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以三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打五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叶剑英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他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苏区中央局会议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和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自己后来常说，那几个月，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关键性的飞跃。通过会议的争论和战争实践，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料敌如神，知己知彼，深孚众望，深得人心。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特地找到毛泽东，主动地向他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毛泽东对叶剑英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说：“你刚到苏区，情况不熟，这不是你的问题。项英是军委主席，他有最后决定权嘛！”

二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会后，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叶剑英未参加宁都会议，但对会议撤销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表示不同意见。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苏区中央局对创办红军学校十分重视。在建校之初，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经

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红校已初具规模。

叶剑英到校上任时，虽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他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红校的教学和训练必须从红军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

抓好教员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有的是留苏、留日的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叶剑英决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首先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每次学习讨论会开始前，叶剑英都会指定中心发言人。待中心发言人讲完以后，其他人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予以评论和补充。讨论会结束时，再由会议主持人对讨论的内容进行总结。这样教员边教边学，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叶剑英还经常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人到校作报告。

三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

1934年五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甚至连毛泽东也未通知。叶剑英回忆说：“那时蒋介石采取堡垒战术，节节推进，步步为营。苏区很小了。鱼很大，但盆子很小，养不活。最后决定长征是没有办法才采取的行动。毛主席不同意他们那样打，打那么长时间。他主张深入到敌人心脏里去，调动敌人，采取主动，可惜他的正确建议没有被中央

接受。”

当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拖着带伤的身体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

叶剑英十分关心遵义会议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他冒着大雨，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山坡上冲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狙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要吃枪子了！”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老城的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



谋长邓萍不幸牺牲。三军团向中央发电报，指名要求叶剑英去接任。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方需要派得力的干部，便同意了三军团的要求。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成立军事指挥小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中间，敌机突然袭来。叶剑英眼疾手快，急呼：“主席跟我来！”他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到山脚边的茅草地里，隐蔽起来。敌机空袭过后，会议继续。长征中，叶剑英两次为中央机关解围，保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故事，在红军中传为佳话。毛泽东十分赞赏叶剑英遇险不惊、急中生智的胆识。

四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约十万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党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指出向新疆、青海、西康发展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

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又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这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毛儿盖前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徐向前的要求，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等告别。毛泽东同他作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十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奔向毛儿盖，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8月3日，中共中央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贻误战机，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军、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剑英到三十军与军长程世才亲自找向导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开会，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楞的行军路线。

叶剑英一看路线定下来心里很高兴。他请示毛泽东说：“这一段路线我找向导打探过了，还是让我带个先遣队先走吧，蹚一蹚路！”毛泽东立即表态同意：“那好，带一个团不够吧，是不是带两个团？”随即征求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徐陈同意后，便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

叶剑英率领部队经过几天几夜草地上的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叶剑英在进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进班佑后，敌人三千多骑兵又来向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缴获了敌军许多马匹。第二天，程世才派出两个营的部队去“打粮”，又从敌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叶剑英向程世才建议，把战利品分出一部分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秦邦宪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太谢谢啦！”

叶剑英和程世才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叶剑英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

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要走四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接近大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

毛泽东很重视叶剑英参谋长的意见，他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后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吧。”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出发。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三十军继续北上”。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

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直至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没有叶剑英截获“密电”并采取勇敢机智的斗争行动，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当机立断，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的话，会出现不堪设想的结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此多次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板荡识忠臣”，为党为人民立了一大功。

1935年9月中旬，在哈达铺毛泽东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1937年3月21日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红一军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我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毛泽东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与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一年，途经11个省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首史诗谱写的壮丽篇章，永放光华。



五

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11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8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部参谋长。

11月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这次战役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侵略我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红军立足的陕北根据地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薄，粮食短缺，供应困难，又处在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党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放在那里？这是党关心的大问题，但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党中央迫切需要对新的形势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策略路线与战略方针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在讨论党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叶剑英积极提出建议，拥护党的正确主张。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特复电叶剑英等：“对战略方针的提议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的意见，洛甫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会上均无不同意见，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地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后天讨